励网民记载身边点点滴滴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感受，被称为短视频网站的“清流”。这些两微一端，共同凝聚起了强大的网络正能量。  
　　在这次获奖账号和客户端中，还有一批高校、科研院所和文博机构账号。改变网络新平台的舆论生态，也需要涵养文化水源、加厚文化土层。像“@中科院之声”“@故宫博物院”这样的专业文化学术机构登录微博，对于利用网络平台培植和传播科学理性和文化情怀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 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：“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，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、引导力、影响力、公信力”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”。“两微一端”平台就是舆论的前沿阵地，发挥新媒体成风化人、明辨是非、凝心聚力的作用，喜见多年的耕耘播种已经开花结果。使每个账号、每篇帖文透露出温暖与善意，每个APP在迭代过程中体现出便民与服务意识，互联网这个“最大变量”就能释放更多正能量，以协同之力促进社会治理格局的进步。  
　　点餐、读书、游戏，内容和服务多种多样；开通成本低，无须写代码，平台用户多……自去年正式上线以来，微信小程序成了不少商家和用户的得力助手。然而，据调查，一些违规经营现金贷的企业也瞄准了这一途径，对“黑贷”业务进行“包装”后，以小程序的形式上线，继续违规从事贷款业务。  
　　这正是：  
　　借贷收益多，  
　　一“微”把利谋。  
　　“包装”碰红线，  
　　法规须严守。  
　　曹  一图  锡  兵文    
　　穿上英姿飒爽的警服，惩奸除恶、守护正义，曾是我的梦想。然而我从未想过，自己有一天会和毒品进行较量。五年前从部队转业后，我来到郑州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，从此进入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。  
　　成为强制戒毒所民警之前，我没有专门了解过毒品的社会危害，对戒毒工作也知之甚少。入警之后，我学习了相关知识，也了解到，自2008年禁毒法实施以来，我国已累计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100余万人。对于这个数字，我并没有太深的认识，直到与戒毒人员面对面，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家庭在毒品面前枯萎凋零、支离破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怎样艰巨的责任：这是一场和毒品的较量，挽救一名戒毒人员，也就是从毒品手中夺回一个人质，拯救一个家庭，就是为建设平安中国出了一份力。  
　　戒毒工作是一项需要耐心、细心和爱心的工作，不仅要关心戒毒人员的安全和健康，还要关注并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；不仅要挽救他们被毒品摧残的躯体，还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、回归社会。我分管的病室里有一位50岁左右的强戒女学员，她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由于意外致残导致失去生活希望，自甘堕落，进而接触毒品，有近20年的吸毒史。不论是监督她服药到手、看药入口，还是心理疏导、看护饮食起居，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。开始时屡次沟通都告失败，为此我翻阅了大量心理学书籍和工作资料，直到从她儿子的角度打开缺口，才慢慢进入了她封闭的内心，引导她逐渐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她对我的工作也开始认可，有次还对我说了声谢谢。简单两个字，意味着她对新的人生产生向往，让我很受鼓舞。  
　　有人说，“一朝吸毒，十年戒毒，终生想毒”，可见毒品危害之大，戒毒工作之艰难。尤其是近年来新型毒品蔓延，毒害了很多青壮年，需要我们给予格外关注。比药物治疗更困难的，是帮助吸毒人员恢复信心、回归社会。为此，我们戒毒所根据长期实践，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。比如，以科学治疗为原则，根据戒毒人员情况，实行分期管理：脱毒期以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相结合，细心看护，帮助减轻戒断症状；康复期以心理矫治与身体康复相结合，通过法治教育、毒品知识宣教及多种康复训练，使戒毒人员的身心得到康复，为回归社会做好准备，等等。阻断毒品的危害，帮助吸毒人员重新回到生活正轨，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斗。  
　　“鸡蛋从外打破是毁灭，从内打破是生命”。戒毒人员是违法者，同时也是受害者。采取强制措施是一种手段，也是来自法律的关怀，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毒品对社会和家人的危害，积极配合并自愿戒毒。尽管条件艰苦，资源有限，我们身为专职管教必须严以律己。在这堵高墙大院里，我们不仅是警察，还是学员的心理医生和人生导师。我愿用自己的微薄力量，为他们驱散黑暗，点亮前行之路，鼓励他们走向光明。  
　　（作者为河南省郑州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）    
　　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，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，敢打必胜的基石也必将更为稳固  
　　  
　　“对1978年以来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重新梳理，按照已有政策一一对应”。日前，民政部负责人表示，将全面启动“清零行动”，凡是没有落实安置政策的坚决落实。“一人不落”的国家承诺，在寒冬中给了为国出征的老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契合全社会爱军拥军的心愿，更为强军兴军注入正能量。  
　　解决军人后顾之忧，是军队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当前我军全面重塑、浴火重生，退役士兵安置得好不好、政策落实得到不到位，直接关系军人权益的保障、现役士兵训练积极性和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。军旅生活较为特殊，很多军人服役期间为国戍边无怨无悔，但退役之后却不太容易融入社会，这其中，既有历史遗留问题，也有现实困难。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兵源聚集地区经常面临“僧多粥少”情况；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的推进，客观上导致安置能力下降，行政安置和市场规则“水土不服”。时代跑得飞快，对于把青春献给军营的最可爱的人，我们必须拉一把、扶一程，不让他们流血流汗再流泪。  
　　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，解除现役军人后顾之忧，既是应尽责任，也是法定义务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从出台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作的意见》等政策法规，到划定“中央企业新招录职工中退役士兵比例5%”的硬杠杠，再到明确“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的退役士兵不得低于80%”的硬要求，无不显示了对军人的关怀厚爱。此次启动“清零行动”，不仅直指增量问题，更将时间跨度扩展到40年，彰显党和国家坚定决心。让机制建设符合中央要求，让政策落实赶上老兵期待，做好这些工作，既是落实有关法律规定和中央精神的既定要求，也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强军新征程的必要之举。  
　　过去40年存在的安置问题，叠加每年增加的待安置压力，涉及范围广、牵扯利益多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机制落实刚性举措，对落实不到位的严肃处理；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协调、反馈机制，让退役军人有人管、有人帮，过度维权时有人理性引导，利益受损时有人挺身而出。近段时间，为落实十九大的最新要求，各地陆续建起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，迈开了制度化保障军人权益的第一步。接下来要抓紧在政策落实落细上下功夫，创新工作思维方法，提高执行力，实现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军队、地方政府、接收单位之间的有序衔接。  
　　经受过军营历练的人，自有坚毅、担当、自律等素质。给退役军人一个合适的平台，他们就能找到人生继续出彩的舞台，更可成为重要的人力财富。开国将军甘祖昌放弃长期疗养机会，坚决回乡投身乡村建设，反哺一方水土；几十年来，成千上万退伍军人二次就业，很多人成为社会中流砥柱。中国军人当抓住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时代机遇，戎装在身时矢志为强军兴军苦练打赢本领，解甲归来更在不同战场主动作为、续写荣光。  
　　兴兵强兵，没有人是旁观者，地方政府和机关企业更应该勇担责任，突破利益藩篱、摆脱部门掣肘、融合军心民心，像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，“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分内的事”。兵者，国之重器。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，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，敢打必胜的基石也必将更为稳固。  
　　深夜，村民突发疾病。因为没有路，救护车进不来，其他村民用门板做成担架，一路狂奔。可紧赶慢赶，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在沂蒙山区采访，听到这个故事，大家唏嘘不已。其实，从村里到镇上，总共不过15公里。  
　　“路，就是山里人的命。”到很多地方走一圈，才知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从一个普通群众的脱贫致富，到一个乡村的振兴，再到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，哪一样都离不开路。  
　　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农村公路，农村才会有人气、财气，才能有振兴的基础和资本。隆冬时节，记者深入四川藏区、沂蒙腹地、浙江山区，探访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成效，体味群众出行不再难的欢欣，见证乡村振兴的新气象。  
　　四川小金——  
　　筑路奏响脱贫曲  
　　种玉米、土豆，亩均年纯收入500元；种酿酒葡萄，亩均年纯收入5000元。  
　　想脱贫，种啥更管用？  
　　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对小金县农民而言，却是个难解的大问题。账谁都会算，可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：有想法，有胆量，就是没路。  
　　看看小金县的地理位置就知道：位于四川省西北部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端，属典型的高山峡谷。在这个深度贫困县里，一半行政村建在高半山上，耕地都在七八十度的山坡上。人爬上去都费劲，哪还伺候得了“金贵”的酿酒葡萄？  
　　对于出行，当地群众这样自嘲：“看见屋，走到哭；望着山，走得瘫。”下马厂村村支书黎国林说，过去村里都是羊肠小道，难走不说，安全隐患也大。  
　　如今再到下马厂，中巴车从山脚下沿路而上，可以一直开到海拔2600多米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。经过几年建设，全村已拥有基地路2公里、产业路8公里，实施窄变宽和翻砂整治工程3.3公里。  
　　曾经的荒山荒坡，变成了脱贫攻坚的“聚宝盆”。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进入快速发展期，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。村里23户贫困户、93人都参与了酿酒葡萄种植，到2017年全部实现脱贫。  
　　“他现在肥得很！”几个妇女一边给葡萄树剪枝，一边打趣站在一旁的兰国华。他家种了5亩葡萄，收入非常可观。  
　　“国家政策好，路修得好，车子开到地头上，小型机械也能进来，收葡萄的时候，五六天就能忙活完。”55岁的兰国华，种了几十年地，有着深切的体会。只有239户的下马厂村，如今各种生产生活车辆已有七八十台。  
　　像下马厂村一样，在小金县，脱贫攻坚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正越来越畅通。通过持续攻坚，小金率先在四川民族地区实现了“通乡油路100%、村道硬化率100%、农村公路安保基本全覆盖”的目标。  
　　路通了，产业也发展起来。2014年以来，小金县建成农村产业路1650公里，带动发展生态蔬菜、特色水果、酿酒葡萄等五大优质生态农产品基地7600余亩，建成牦牛标准化养殖场54个。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的17.58%下降至目前的2.85%。  
　　沂蒙山区——  
　　山货进城乐农家  
　　“俺们这儿，抬头是山，回头也是山，左望望是山，右望望还是山。”山东临沂市费县大田庄乡，2万多父老乡亲便世代生活于这群山之中。  
　　西瓜、樱桃、蜂蜜……大山赐予山里人宝贵的财富，却也阻隔着这里与外界的联系。“过去村里全是很窄的土路，就连三轮车都难开进来。”57岁的周家庄村村民张宝珍，经常凌晨4点就出发，骑着自行车、驮着瓜篓赶去临沂市区卖西瓜，一次顶多驮60公斤瓜。为了不在市区过夜、省下住宿费，他一般都不敢要高价，“卖完西瓜回到家，一般就得晚上9点，活了大半辈子，最盼的就是路！”  
　　对于想通过开网店改变命运的费县薛庄镇农民闵超而言，路同样重要。2009年起，他在网上注册了电商店铺，主打土鸡蛋、樱桃、羊肉等土特产，“好多山货都特别金贵，从村民手里收购过来后，还没到家就会颠出不少破损。”  
　　一次，有位顾客夜里下单要了一批山货，要求第二天必须发走，这可让闵超犯了难。“店铺刚开，不能随意拒单。可那天还下着小雪，路上又湿又滑……”不愿轻易放弃的闵超只好骑车在崎岖的山路间奔波了10多公里，“脸也磕破了，车也摔烂了，那些货还不够一辆自行车的钱。”  
　　2014年起，费县大力开展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大田庄乡境内已有18公里省道联通南北、21公里县乡道纵贯东西，加上300多公里村道，乡里终于实现了“村村通”，85%的村还实现了“户户通”。  
　　闵超再也不必为收货难、发货难而头疼。“时令水果从树上摘下来，半小时车程就能到县城，1天之内就能送到济南市民的餐桌上。”修路前，闵超的年营业额一直在10万元上下徘徊；2014年路一修通，立马攀升到200多万元，如今又增至3000万元。  
　　从“村村通”到“户户通”，大田庄的人气渐渐旺了起来，张宝珍的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。“现在好了，小货车能直接开到地头。这下俺底气也来了。”面对记者，张宝珍举起三个手指笑着说，“光是门口这3亩大樱桃，一年就能收入3万块哩！”  
　　浙江安吉——  
　　慢行绿道美山村  
　　油亮的沥青路蜿蜒前行，串联起一座座绿意盎然的公园、广场，又伸向青翠的群山、幽深的竹林……漫步浙江省安吉县刘家塘村，恍若来到了风光秀丽的度假区。  
　　20年前的刘家塘，可并非这般模样。那时，村民们在附近山上开矿采石、办石灰窑，村子常年笼罩在烟尘中，安吉还一度被国家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。  
　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！”在“生态立县”发展思路的指引下，安吉逐步关停了境内的矿山、水泥、造纸等高污染企业。2012年，新的发展契机又悄然而至——杭长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成，将安吉一下拽进了杭州“一小时交通圈”。  
　　“‘主动脉’畅了，我们还得努力把‘毛细血管’打通。”在村支书褚雪松看来，离县城仅13公里、环境宜人的刘家塘村正适合借此东风发展乡村旅游。2013年起，他带领村民一道谋划建设慢行绿道，串联起“一中心两纽带三片区”，从而把全村打造成大景区。  
　　上下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为了支持刘家塘村公路改造项目，县里、镇上拨出300多万元资金，县交通设计院也提供了专业支持。听说要修路，村民们也都来了劲儿。改造杨家坞自然村一条长1.4公里的泥巴路时，20多户村民主动贡献出20多亩竹林。要知道，每亩竹林一年的收益都在2000元以上。  
　　2014年，路打通了，自那以后，一到周末，前来刘家塘的游客便络绎不绝。2017年，全村一年接待游客达8万人次，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3万元。  
　　“车在路中行，人在景中走”。近年来，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“美丽公路”理念，以打造“美丽农村路”为载体，串联起“山海林田湖、城镇乡村景”。2017年，浙江共培育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村1155个，接待游客3.38亿人次，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近2.5万元，居全国首位。  
　　2月6日一早，93岁的“中国核潜艇之父”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，专程从武汉来到杭州，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中心，接受白内障手术之后的第一次复查。  
　　眼科主任姚玉峰为黄旭华检查了视力和眼压，复诊的结果让人倍感欣慰：左右眼视力均达到0.8+，眼压也都正常。  
　　“黄老的视力恢复基本达到了年轻人的正常视力。”姚玉峰说，一个月前手术时，考虑到黄老的超高龄及白内障病史，预计恢复可能较慢。现在恢复得那么好，说明手术很顺利。  
　　“把视力恢复好，我还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好多年呢。”黄旭华开心地笑了，“现在虽然不在科研一线，但我是年轻人的‘啦啦队’。”  
　　黄旭华与姚玉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结缘，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  
　　黄旭华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，1958年至今一直献身祖国核潜艇事业，以身许国、隐姓埋名三十载，其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。姚玉峰教授成功主持世界上第一例由他独创的姚氏法角膜移植术，婉拒国外高薪毅然回国，20多年来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名。当时，他们都作为全国道德模范代表，出席2017年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。  
　　会上，姚玉峰听黄旭华院士的报告时注意到，老人戴着老花镜，还用一个很大的放大镜，一行一行地“扫”过讲稿。  
　　姚玉峰会后主动找到黄旭华询问得知，黄旭华从45岁开始看东西就吃力，戴的老花镜度数越来越高，还是看不清，只好加上放大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照。“问过好多医生，都说以我现在的年龄还是不做手术为好。”黄旭华说。  
　　90多岁超高龄、患了几十年白内障，这个手术对医生来说，风险、压力非常大。但如果不做手术，几乎不可能找到重新恢复视力的办法。姚玉峰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医疗团队，决定把这个压力扛起来。  
　　今年1月2日，黄旭华来到杭州。姚玉峰和团队给老人做了全面检查，“当时老人视力不到0.1，白内障呈棕褐色，再不治疗很可能就会失明。”  
　　随后医院组织全院大会诊，准备了各种预案，尽一切可能降低手术损伤、避免并发症。比如麻醉环节，超高龄的老人，麻醉风险很大，最后确定局部麻醉的方案，确保病人安全。  
　　1月4日上午，姚玉峰主刀进行手术，整个手术一气呵成，全程只用了13分钟。  
　　术后次日，黄老视力已从术前的不到0.1，恢复至0.3，能看得清手机短信了；右眼术后第三天、左眼术后第二天，左右眼的视力分别都恢复到了0.6。  
　　出院时，黄老向眼科中心赠送了12个字——“周到细致，一丝不苟，万无一失”。他说，这是周总理当年送给核潜艇研究团队的。  
　　姚玉峰说，黄老视力恢复后马上想到“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工作好多年”， 让他深受震撼，“老一代科学家身上的报国情怀和献身精神，深深感动了我们，也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”  
　　驿道石苔密布，远望层峦叠翠。新春佳节将至，记者来到江西省大余县，深深感受到，这个中国钨业开采发源地，正阔步走进转型发展的“春天里”。  
　　工业脱困：“一矿独大”转型破局  
　　在大余西华山矿场入口处，镌刻着“中国钨矿发现地”几个大字。20世纪初，这里开始开采钨矿，大余的命运从此与钨难解难分。  
　　然而，百年开采也让大余资源面临枯竭。2011年底，大余县被列入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。“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2/3的经济指标排赣州市末尾。”大余县县长钟旭辉说，县里通过财政、金融手段为企业救急脱困，同时着手引导企业另觅新路。  
　　大余云锂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墙上和展柜里，“伟良钨业”的展示资料还没来得及撤下。这家过去以生产钨砂为主的企业，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为电池级碳酸锂生产企业，生产的原料也变成了从外地运来的锂云母矿。“转型投产后，年产值达5亿元。”总经理助理刘永红说。  
　　大余县委书记曹爱珍告诉记者，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恢复，大余的“首位产业”已由钨及有色金属调整为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。此外，新引进工业级无人机、汽车整车生产及零部件配套产业。大余非钨产业税收占工业税收的比重已提高到45.5%。  
　　生态脱困：绿色修复秀美重现  
　　矿山开采，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。2013年4月，大余被列入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区。  
　　环境治理，规范钨矿开采是基础。大余县关闭小矿山40多个，取消大型矿权证32个，开展9个绿色矿山的建设试点工作，推进3个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。  
　　大余地处赣江重要支流——章江源头，为护好一江清水，大余先后关闭沿线108家排污企业，设立水源地保护区红线，禁止新上排污项目。  
　　左溪河，位于大余县石雷钨矿下游。“这里的河水清了，是因为建了拦河坝和引水渠。”矿长助理刘财禄说，石雷钨矿建设清污分流工程，在河流上游建造拦河坝，把上游河道径流引入水渠，河水和雨水被直接引入下游，避开了污染河段。  
　　目前，大余县空气质量常年保持一级水平，出境断面地表水质达标率稳定在90%以上，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%，被评为“江西生态文明十佳示范县”。  
　　民生脱困：从“地下”回到“山上”  
　　黄龙镇大龙村，过去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都从事与开矿有关的工作，许多人常年工作在地下。“我在矿上干了17年，产量越来越少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。”村民蓝小平说。  
　　当人们不得不把目光从矿上移开，产业发展反而有了多种可能。从大龙村走出去的矿业老板唐向阳发现，大龙村的旅游资源其实和当年的矿产资源一样好：青山、绿水、古刹、飞瀑，还有优越的交通条件。  
　　几年建设，大龙村成为4A级旅游景区和5A级乡村旅游点。蓝小平也从一名老矿工，变为景区的管理人员。大余全县11个乡镇，规划建设了近30个乡村旅游点，“百里乡村旅游长廊”连点成线。很多像蓝小平一样的矿工，从“地下”回到了“山上”，办起了农家餐馆和农家旅舍。  
　　2016年，大余县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次超过第二产业。县旅发委提供的数据显示，旅游产业带动全县直接或间接劳动就业3.5万人，贫困群众的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70%以上。  
　　“都说大余是资源枯竭型城市，但只是矿业资源枯竭，生态资源、旅游资源、农业资源这些绿色资源的发掘，加上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，大余依旧大有可为。”曹爱珍说。  
　　500米长的站台，每天接发85趟高铁列车，相邻2趟列车最短间隔9分钟，每天到发旅客1万余人。这里，就是上海虹桥站20号站台，在虹桥站中转的高铁全部停靠在这个站台，承担着合肥、淮南、温州、厦门、赣州等方向中转列车停站上下客的重任。  
　　19：07，G7584次列车开始检票，潮水般的人流沿步梯和电梯涌下来。“这里是9号车厢，大号车厢请往左，小号车厢往右。”“请大家站在安全黄线外排队站好。”已忙碌了十余个小时的客运员张金用沙哑的嗓子不断地提醒着旅客。  
　　站台上，还有两名客运员李飞飞和金鑫，他们分别“驻守”在两个检票口通往站台的扶梯口，同张金一道守护着站台的安全。  
　　从早上8点接班，8：32、8：46、9：10、9：25、9：34、9：44、9：54……一趟又一趟高铁密集到达，张金和他的同事们在各个车厢门口、电梯口、中转换乘通道间来回奔走，直到中午11：40。别说喝口水放松几分钟，3名客运员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“太忙了，我们只顾得上跟对讲机和旅客说话。”一天下来，张金的计步器显示他走了13公里2万步。  
　　20号站台南北通透，冬天呼啸而过的穿堂风吹进脖子、吹透衣服，一天下来，手脚冻得冰凉麻木。“最多时，我在羽绒服制服里穿了一件大衣、套了2件毛衣，还随身带着保暖贴。”张金说。  
　　不同于始发列车，20号站台中转列车的放客时间短，相邻列车最短间隔仅9分钟，列车最短停站2分钟。在短短几分钟内，客运员不仅要组织好旅客乘降，还要做好站台巡视、站车交接、安全提示、中转换乘引导等工作，同时还要处理突发情况。  
　　“看似简单的接发车，想要做好可有着大学问。”参加工作刚满1年的金鑫，体会已经很深。现在，3名客运员已形成默契，他们掌握了每趟到发列车的旅客集中上下车的规律，并根据现场的情况，及时移位到上下车人数较多的车厢，及时做好引导。  
　　“哔——”下午4：32，随着G1376次列车驶入20号站台，李飞飞拿着哨子奋力地吹动着，左手做着后退的手势。在他的引导提醒下，几名正准备越过安全黄线的旅客收回了脚步。  
　　“有的旅客比较心急，看到车子进站就想走近一些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我只能尽力把哨子吹得更响，希望能引起旅客注意。耳朵都被口哨声震得发疼。”尽管如此，张金每次吹哨，还是会用尽全身力气。  
　　列车进站要提醒，列车关门要提醒，旅客穿越黄线要提醒……在20号站台，口哨是易耗品，“最多3个月就要换一个，不然就吹不响了。”  
　　16个硕大临时雨棚一字排开，入眼的是拖着行李的匆匆身影和一张张急切的脸，不一样的是，行李箱代替了编织袋，检票口外颇有秩序的长龙代替了过去的人头攒动……  
　　2月3日，记者来到广州火车站，这里是全国“春运”发源地，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全国春运的“瓶颈”：一个最初设计发送能力仅2.5万的火车站，曾创造春运最高峰日发送23.2万人次的惊人数据。  
　　“当时为了让旅客挤上春运火车，我们用肩膀顶，用手推。”在广州火车站工作了35年的朱海滨回忆。  
　　“直到今天，广州站都是超负荷运转的状态，但今年的春运跟以前不同了，过去难在‘走得了’，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旅客走得好、走得安全、走得舒心。”广州站站长郭飞跃介绍，春节前广州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13万人次，高峰日14.5万人次，这个数字比历史最高峰削减不少，这也让广州火车站能够腾出人力和精力去改善服务。  
　　来到与广州火车站相距2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，这里是另外一个天地。春运期间广州南站停靠动车组数日均达800趟，日均发送旅客30万人次，到达人数与发送量基本持平，每天有近60万人次通过广州南站进出广州。  
　　走出地铁口，记者就直接进入了广州南站一楼大厅，150多台互联网售取票机可供便捷取票，通过人脸识别进站，手扶电梯直接送记者到达3楼候车大厅；通过检票口，下到二层站台就可便捷登上高铁。“早上在广州喝早茶，晚上就能吃上北京烤鸭。”G79次列车长仲召爽笑着说。  
　　“春运期间，要让60万人安全有序进出广州南站，就必须实现快运、快